

非洲族群冲突的最新进展及冲突管理

赵 磊

[内容提要]非洲是多族群聚集的大陆,也是族群冲突频发的大陆。非洲族群冲突的原因错综复杂,加上在某些情况下族群冲突管理的方式失当,进一步加深了族群之间的矛盾。因此,深入分析冷战后尤其是21世纪非洲族群冲突的最新进展及其管理方式对区域和平乃至世界和平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非洲 族群冲突 冲突管理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1)03-0078-05

族群冲突(Ethnic conflict)同非洲历史本身一样古老。目前在非洲大陆,很多国家和地区依然处在不同程度的冲突与动荡之中,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金)”]、科特迪瓦、索马里、几内亚比绍、苏丹、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西撒哈拉、乌干达、乍得以及中非共和国等。其中,刚果(金)基伍地区、科特迪瓦全境、索马里的索马里兰、苏丹达尔富尔及南苏丹、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尼日利亚高原州地区、乌干达北部地区的冲突都与族群问题密切相关。

一、非洲族群冲突的最新进展

非洲有53个国家,都是由多族群组成的国家。^①由于特殊的殖民历史和地理状况,非洲大陆基本上具备了诱发族群冲突的所有因素。泰德·戈尔(Ted Robert Gurr)和芭芭拉·哈夫(Barbara Harff)在研究族群问题时,将冲突族群区分为“族群民族主义者”(ethnonationalists)、“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s)、“社群竞争者”(communal contenders)和“族群阶级”(ethnoclasses)四类。^②其中,前两者或要求与国家分离或寻求自治,如塞内加尔的卡萨芒斯地区、尼日利亚的比亚法拉地区;后两者则要求在现有国家体制内寻求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如吉布提第二大族群阿法尔人对最大族群依萨人长期垄断政府要职表示强烈不满。

进入21世纪,非洲的族群冲突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第一,社会排斥政策导致严重的族群冲突。如果一个族群拥有政治权力,而其他族群却被排斥在外,或者一个地位较高的族群明显地剥削或压制另一个阶层较低的族群,从而导致特定族群被排斥在国家治理体制之外(不能获得必要的经济资产、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以及基本的公民地位和政治身份),就有可能导致族群冲突。延续

至今的科特迪瓦内战是这一类型冲突的典型事例。冷战之后,科特迪瓦的繁荣吸引了很多西非人,如布基纳法索人。他们移居到此,从而引发了选举投票权之争。1995年,大量布基纳法索人在塔布省的族群冲突中被杀害,因为他们被看作是非洲裔的“外国人”。冲突的导火索是政府强行通过《血统论法案》,即要求总统候选人父母都要出生在科特迪瓦,从而导致北方的总统候选人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被直接取消参选资格。瓦塔拉代表北方的穆斯林,尤其是从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地区来的贫苦移民。

2002年9月19日,来自北方的武装力量进行集结,开始攻击大城市。他们的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明确定义“科特迪瓦公民”、总统投票权等基本政治权利。2005年5月18日,联合国以建立“非军事区”的方式进行冲突管理,以分隔冲突双方,从而将科特迪瓦全国划分成面积相等的北南两块,北部为反政府军所控制,而南部则为政府所控制。2010年12月2日大选后,科特迪瓦出现了北南两位“总统”分庭抗礼的乱局,由此陷入了严重的族群冲突之中。

第二,分离主义呈现上升趋势,加剧了族群冲突。赫拉克理德斯(Alexis Heraclides)在对族群冲突进行研究时,认为分离主义需要符合三个要件:(1)将自身定位为无法同中央政府融合的族群。(2)本族群感受到在一国内遭受不平等待遇。(3)本族群占据一定面积的领土。^③目前,在非洲存在分离主义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索马里的索马里兰、苏丹达尔富尔、南苏丹等。

成立于1984年的“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是埃塞俄比亚反政府武装组织,主要活动于埃塞俄比亚东部的索马里州及索马里南部地区,其宗旨是谋求索马里人占多数的欧加登地区从埃塞俄比亚完全独立出去。该阵线认为埃塞俄比亚在当地的驻军是武装侵略者,因此自成立以后,便与埃塞

俄比亚政府军发生多次武装冲突。在索马里,其北部迪尔族于1991年宣布独立,成立索马里兰共和国,占有原索马里18个省中的5个。目前,前宗主国英国积极推动国际社会承认索马里兰独立。但是,非洲联盟不鼓励任何更改现有非洲疆界的举动。在苏丹,根据各方2005年达成的《全面和平协议》,苏丹南部地区已于2011年1月9日举行公投,以决定该地区是否从苏丹分离。南苏丹如分离成功将对整个非洲局势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将有可能引发更多族群的分离倾向以及族群冲突。

第三,环境、资源问题日益诱发族群冲突。今天,环境变化、资源稀缺和族群冲突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明显。在萨赫勒地区和非洲之角,争夺资源的战争不断扩大,有时冲突跨越了国界,部分原因是因为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荒漠化和牧场面积不断缩小。目前,在乍得湖周边国家——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等国,对水资源的争夺不断引发新的族群冲突。在刚果,由图西族人组成的“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反政府武装主要控制刚果北基伍省地区,靠矿产资源的非法贸易获利,并常因争夺资源而与“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刚果爱国抵抗联盟”等多个武装派别冲突不断。在尼日利亚,信奉伊斯兰教的豪萨族、富拉尼族与信奉基督教的伊博族为争夺土地和水资源而经常发生冲突。在苏丹达尔富尔,黑人部落富尔族虽然同阿拉伯人一样都信仰伊斯兰教,但因为水资源争端而同札哈瓦族、马萨里特族等黑人部落组成“苏丹解放军”、“正义平等运动”等反抗武装组织,与阿拉伯民兵进行军事对抗。

因此,在对非洲的族群冲突进行评价时,必须系统地考虑到环境和资源因素的作用,如土地使用权和保有权、木材砍伐、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贸易以及开发自然资源导致的收益分配不均等问题。

第四,民主化激化“分裂社会”的族群冲突。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非洲国家应该开放党禁,允许政党自由竞争和民主选举。^④中国学者则认为,非洲过早、过急的民主化可能导致部族主义、族群冲突因政党活动而复活。^⑤的确,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让人们看到,民主不仅会带来公民自由与政治平等,而且也造成了大范围的冲突,这些冲突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是国家内部的冲突。^⑥

在由传统部族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期内,“分裂社会”在民主化的影响下,导致族群冲突较前一时期更加频发。“分裂社会”,即由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语言文化或族群等团体组成的社会,各团体之间的差异造成了政治认同的分歧。^⑦当民主到来时,分裂社会中的团体一般都会

组建自己的政党,拥有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政治集团、传媒机构,甚至武装组织。为了赢得选票,各政党候选人采取的策略往往是打“族群”牌,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和族群冲突。此外,严重的社会分裂,尤其是族群分裂,不仅让国家的民主转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也使转型之后的民主政体始终无法正常运行。据统计,从1989年到2002年,全世界发生了116起主要的武装冲突,其中仅有7起是传统的国家间冲突,其余109起几乎都是与民主化有关的国内族群冲突。^⑧

2007年,肯尼亚就因民主选举问题而引发了严重的族群冲突。12月30日,肯尼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齐贝吉在大选中获胜。反对党“橙色民主运动”领导人奥廷加指责齐贝吉在选举中严重舞弊。在肯尼亚的政治生态中,有按族群划分政治阵营的传统,历任总统都比较“照顾”自己族群聚居的地区。肯尼亚第一大族群基库尤族是肯尼亚总统齐贝吉的坚定支持者,奥廷加则属于肯尼亚第三大族群卢奥族。因此,在大选过后,基库尤族和卢奥族相互攻击,并由此演变为长达两个多月的族群冲突和暴力骚乱。

第五,宗教因素往往与族群冲突相互交织,增加了冲突管理的复杂性。近年来,有些非洲国家制定了公开歧视宗教少数族群的政策,如规定只有信奉国教的人才能成为公民、担任公职的人必须宣誓效忠于特定宗教等。目前,在非洲,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或非洲原始宗教的冲突日益突出。其中,埃及、苏丹等地处北非且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更容易面临这方面的棘手问题。在埃及,约有800万信奉基督教的科普特人,约占全国总人口10%,他们抱怨遭受宗教歧视以及被逼改变宗教信仰等。埃及政府虽然采取了一定的冲突管理措施,如增加基督教堂的修建数量、让更多的科普特人当选议员等,但科普特人依然时常遭受暴力侵犯。苏丹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北部六省均受到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但南部却仍有基督教和其他非洲宗教的影响。类似苏丹北南对立的社会形态,在索马里、乍得、尼日尔、马里、尼日利亚也有,但没有像苏丹这种如此完整的伊斯兰化区块。^⑨为对南方施行“同化政策”,苏丹政府在全国推行伊斯兰法,但最终的结果却导致“苏丹人民解放军”的成立,后者要求在苏丹南部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

第六,外部力量积极介入非洲族群冲突。冷战后,非洲国家之间直接发生战争的几率很低,但是内战波及邻国、邻近国家支持与其有血缘关系的族群以及原殖民母国干预前殖民国家冲突的几率则相当高。例如,从1993年至2003年间,刚果(金)曾两次爆发内战,与刚果(金)具有相同族群构成的卢旺达、布隆迪等多个邻国以及至少20多

个武装团体卷入冲突,因此被称为“非洲的世界大战”,其影响持续至今。联合国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刚果(金)内战期间共发生了617起杀害平民等严重罪行,其中包括种族灭绝罪。”^⑩

又如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出现后,互为邻国的苏丹与乍得关系出现波折。2003年2月,达尔富尔地区发生武装冲突,苏丹政府指责乍得向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提供帮助和庇护。2008年5月10日,苏丹达尔富尔反政府组织“正义平等运动”成员潜入苏丹首都喀土穆附近地区,并与政府军发生冲突。随后,苏丹政府指责乍得政府应为该组织潜入喀土穆并从事破坏活动承担责任,并宣布与乍得断交。同时,乍得政府也指责苏丹支持乍得反政府武装。2009年5月15—16日,乍得空军三次空袭位于西达尔富尔地区的乍得反叛分子营地。苏丹政府称袭击为“战争行为”,并表示苏丹部队已作好还击准备。^⑪

需要指出的是,原殖民母国对相关非洲国家依然具有强大的干预能力。例如,比利时在卢旺达、布隆迪、刚果(金)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法国与中非共和国、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加蓬、塞内加尔、多哥、喀麦隆和乍得签署了军事保护协定,在各国均有基地和驻军。在上述国家发生冲突时,法国总是表现出较强的干预意愿和干预能力。英国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国家。利比里亚是由美国黑人移民于1948年7月建立的,因此,当利比里亚发生冲突时,美国总是主动介入冲突管理进程。

二、有关非洲族群问题的冲突管理

有学者将非洲冲突管理区分为三大类:一是以武力作为解决的工具,二是以协商作为解决的工具,三为冗长的内战。^⑫ 本文认为,就冲突管理的过程而言,可分为冲突预防、冲突控制和冲突解决三大机制。其中,冲突预防机制包括行动性预防和结构性预防,前者指危机迫在眉睫时所采取的措施,后者是确保危机不发生,或一旦发生,确保危机不再重演的相关措施。卡内基预防致命冲突问题委员会的研究结果指出,“国际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的七次重大干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索马里、卢旺达、海地、波斯湾、柬埔寨和萨尔瓦多)中将大约2000亿美元花在冲突控制上,但如果采取更有效的预防性方法有可能节省1300亿美元。”^⑬ 就冲突管理的手段和性质而言,可分为积极性冲突管理和强制性冲突管理两种形式(见表1)。其中,强制性冲突管理是指未获得一致同意或当事国同意而对他人冲突进行的干涉,具体包括军事干预、制裁或刑事起诉等。

就冲突管理趋势而言,国际社会越来越强调

从反应式文化走向预防式文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2001年提交了《预防武装冲突》报告。报告指出,“为了使早期预防行动奏效,必须找出并解决导致冲突的多重根源。冲突的直接起因可能是公共秩序突然大乱,或对某一特定事件的抗议,但是,根本原因可能是社会经济不公平和不平等;经常性的族裔歧视;剥夺人权;参政方面的争端,或由于土地及其他资源分配造成的宿怨。”目前,联合国正考虑适当加强“预防性部署”。该行动的威慑力量不在于部队的军事效能,而在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授权部署所表现出来的国际关注,从而将有关当事方置于严密的国际监视之下,如果当事方诉诸暴力,国际社会将随即采取进一步行动。

表1 冲突管理主要方式

管理领域	管理性质	
	积极性冲突管理	强制性冲突管理
在政治、外交方面	联合国秘书长直接介入;建立冲突情况调查使团;国际呼吁;召开特别国际会议,等等。	外交孤立;暂停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资格;国际斥责;限制外交代表权,等等。
在经济方面	提供新的资助或投资允诺;给予更加有利的贸易条件,等等。	威胁或实施国际贸易制裁;撤回投资、削减援助;对特定人员实行旅行和资产限制,等等。
在法律方面	提供仲裁或法律援助;部署监督人权状况的组织和人员,等等。	设立处理战争罪的特别审判庭;国际刑事法院起诉或审判,等等。
在军事方面	预防性部署;终止军事合作和培训计划;在冲突地区进行巡航侦察,等等。	航空禁飞;武器禁运;威胁使用或实质性使用武力,等等。

目前,参与非洲族群冲突管理的主体主要包括非洲国家本身、非洲区域与次区域组织、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等等。

第一,非洲国家是非洲族群冲突管理的核心和主角。它们的努力主要在于增强自身能力建设,具体包括:(1)促进社会公正,保障不同族群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尊重。在执行国家战略时需要顾及各利益群体,特别是各族群的需求,尊重弱

势群体和处于边缘地位群体的利益关切。在制定政策时应照顾各族群特性,并在族群治理策略上尽量采取柔性的做法,如政治分权、文化自治、优惠的区别待遇以及政治和官僚体系的保障名额等。^⑭(2)将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各项工作的重心。目前,非洲有两亿人营养不良,许多非洲国家依然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问题,非洲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平均只占世界进口额的3.2%和世界出口额的3%。^⑮因此,没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洲的族群融合就将只是一句空话。(3)为各族群的青年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非洲十亿人中大约60%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没有教育经历和就业机会的青年人很有可能被武装集团征募。非洲国家应制定相关战略,使年轻人融入非洲发展、冲突管理和族群融合的主流。(4)禁止小武器、轻武器的非法扩散和贩运。小武器的非法贸易极易点燃、激化族群之间的新仇旧恨。因此,非洲国家必须制定旨在制止小武器非法扩散和贸易的各项措施。(5)摒弃任何歧视宗教少数族群的政策。宗教问题十分敏感,主权国家应扮演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既要促进宗教或信仰自由,也要保护人民免受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侵犯。^⑯(6)消除民主化对族群冲突的负面影响。对有的非洲国家而言,政治体制上的有效解决办法是分权——将中央集权制改为联邦制或采取其他的分权办法,如分区制,即由各地区的族群来轮流执掌行政职位。国家对政党的组建应制定一些具体政策,如禁止各政党在分裂因素(宗教、地区)的基础上组建政党;政党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动员,并表明其拥有全国范围的成员基础。^⑰

第二,非洲区域与次区域组织是非洲族群冲突管理的主要地区性机构。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部非洲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在非洲族群冲突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积极主动。2003年5月,非洲联盟开始建立“非洲常备部队”及早期预警系统。2004年,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正式成立。其主要职能包括对成员国实施军事干预与维和行动;制裁以违宪手段更迭政权者;推动成员国实行民主、良政、法治和保障人权等。2005年7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宣布组建一支由6500名各国军人组成的西非多国维和干预部队,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局势。此外,非洲次区域组织也逐渐建立了自己的预警

和冲突管理系统。1999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通过了《关于冲突预防、管理、解决、维持和平与安全机制的议定书》。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建立了相关机制,专门处理武装牧民集团的跨界冲突问题。大湖区11国于2006年签署了《大湖区安全、稳定和发展公约》。公约参与国将致力于遵守不侵略、促进民主和善治、区域一体化以及在重大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上相互援助的原则。公约规定必须强制性解除非法军事团体武装、防止小武器非法流动、在共同边界沿线建立联合安全管理机制等。此外,2003年3月,非洲国家建立了“非洲国家相互审查机制”,希望通过相互审查以加强非洲内部监督、提高良政水平,从而实现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族群融合。截至2010年7月,共有30个非洲国家加入该机制。

第三,联合国是非洲族群冲突管理的主要国际性机构。除参与非洲维持和平行动外,联合国还积极推动建设和平行动。联合国在1998年出台了《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详细论述了冲突后建设和平的性质和理由。所谓冲突后建设和平,就是在冲突结束时采取行动以巩固和平和防止武装对抗再次发生。建设和平涉及加强国家机构、监督选举、促进人权,特别强调政治包容和族群和解。2004年,联合国秘书长专门任命了一位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其职责是就某一国家或区域可能发生族群冲突、种族灭绝的情势发出警报,提出建议予以预防或制止,并为合作伙伴开拓空间,使他们根据其任务规定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采取预防性行动。2006年5月,在特别顾问的提议下,联合国成立了防止灭绝种族问题咨询委员会,为特别顾问的工作提供指导和支持。咨询委员会由具备冲突预防、人权、维和、外交和传媒等各相关背景的著名人士组成。^⑱此外,联合国还成立了一些其他组织机构,如成立于2002年的联合国西非办事处(这是联合国建立的第一个地区性的冲突预防与建设和平办事处)、成立于1994年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成立于2001年的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上述法庭主要审判在族群冲突期间犯有战争罪、反人类罪以及其他严重罪行的嫌疑人。2005年12月20日,联合国成立了建设和平委员会,以帮助发生冲突后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非洲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第四,非政府组织是非洲族群冲突管理在继

国家和国家间组织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它们虽不是冲突管理的核心角色,但却发挥着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所无法替代的辅助性角色,其职能广泛涉及早期预警、冲突调解、人道主义援助、冲突后的重建、人权保护与良政等领域。^⑨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于2004年修订的“非洲非政府组织名录”(第三版)收录了3776个非政府组织。其中,涉及冲突管理的非政府组织多达483个,如“加纳冲突解决中心”、南非“非洲争端建设性解决中心”等。此外,参与冲突管理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无国界医生组织等人道主义机构;“圣爱智德团体”等教会组织;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等等。上述组织从不同层面介入冲突管理进程,但其核心目标是保护并援助受武装冲突影响的人。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自1992年就开始在刚果(金)的基伍地区开展工作,也是唯一在这一地区提供外科手术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目前,非政府组织在非洲的工作重点是力促冲突国家建立公民社会,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以及民主的方式进行族群和解,以期弥合“分裂社会”的消极影响。

总之,非洲族群冲突的根源和触发因素是多重和相互关联的,不能孤立地处理其中任何一个。因此,必须合力创建一个多元主体共同管理的战略框架,以便就哪些事项应优先处理以及哪些措施最可能产生多重效果达成一致意见。为实现上述目标,国际社会应更加系统地了解非洲族群冲突的原因、背景、趋势,尽可能地达成冲突管理的基本共识,并就此拟订相关路径和衡量指标。

注释:

① 根据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的定义,“族群”(ethnic group)不过是一个具有名称的有着共同祖先和传说、共有的记忆和文化因素的人群;一种与历史的领土或家园有关的联系;一个团结的度量。相关论述可参见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Sources of Nationalism*,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8.

② 戈尔·哈夫《国际政治中的族群冲突》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4页。

③ Alexis Heraclides, “Janus or Sisyphus? The Southern Problem of the Sudan”, in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5, June 1987, p. 215.

④ Larry Diamond and Marc Plattner,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18 - 260.

⑤ 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⑥ Benjamin Reilly, *Democracy and Diversity: Political Engineering in the Asia-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7.

⑦ 严海兵《民主化引发政治冲突的原因及解决方案》,载于《学海》2010年第2期。

⑧ Mikael Eriksson, Peter Wallensteen and Margareta Sollenberg, “Armed Conflict: 1989 - 2002”, in *Peace Research*, Vol. 40 2003, pp. 593 - 607.

⑨ Muddathir Abd Al-Rahim, “Arabism, Africanism and Self-identification in the Sudan”, in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8 July 1970, p. 234.

⑩ 《联合国发布1993至2003年刚果(金)境内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勘察报告》,参见联合国电台网站2010年10月1日, <http://www.unmultimedia.org/radio/chinese/detail/142077.html>。

⑪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的报告》,决议号S/2009/359,参见联合国网站2009年7月14日, 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2009/359。

⑫ Taisier M. Ali and Robert O. Matthews, *Civil Wars in Africa: Roots and Resolution*,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93 - 220.

⑬ Prevention of Armed Conflict,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55/985-S/2001/574, 7 June 2001, see <http://daccess-ods.un.org/TMP/2817183.html>。

⑭ B. C. Smith, *Understanding Third World Politics: Theories of Politic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71.

⑮ See http://www.un.org/africa/osaa/reports/2010-causes_conflict.pdf。

⑯ 《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临时报告》,决议号A/65/207,参见联合国网站2010年7月29日, 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65/207。

⑰ 李安山《非洲民主化与国家民族建构的悖论》,载于《世界民族》2003年第5期。

⑱ 《秘书长关于防止灭绝种族“五点行动计划”执行情况以及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秘书长特别顾问活动情况的报告》,决议号A/HRC/7/37,参见联合国网站2008年3月18日, 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HRC/7/37。

⑲ 罗建波《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冲突管理中的角色分析》,载于《国际论坛》2008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责任编辑:文心]